

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丛书

治理、发展与安全

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

黄河 王润琦 黄昊 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丛书

治理、发展与安全

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

黄河 王润琦 黄昊 等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以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为主题,内容包括: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模式的重塑;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中俄北极油气合作的风险及管控;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供应链的中国布局;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国际技术转移机制建设;中亚有效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澳大利亚船民治理模式与区域性公共产品(1975—2018年);“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为例等。本书的读者对象主要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学者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理、发展与安全: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黄河,
王润琦,黄昊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
(复旦发展研究院智库丛书)
ISBN 978-7-313-24796-4

I. ①治… II. ①黄… ②王… ③黄… III. ①国家政
治—研究②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D5②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51513 号

治理、发展与安全

——公共产品与全球治理

ZHILI、FAZHAN YU ANQUAN——GONGGONG CHANPIN YU QUANQIU ZHILI

著 者:黄河 王润琦 黄昊等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印 制: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字 数:159千字

版 次:2021年5月第1版

书 号:ISBN 978-7-313-24796-4

定 价:45.00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9.5

印 次:2021年5月第1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25-83657309

本书得到复旦—拉美大学联盟 2020 年度课题项目“中资企业在拉丁美洲的国际化发展”(项目编号: FLAUCIDEALABMXPE2005)的资助,谨此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1
第二节	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起源 / 2
第三节	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起源 / 6
第四节	主要思路与主要内容 / 9
第二章	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与全球卫生治理模式的重塑 / 12
第一节	国际卫生公共产品 / 12
第二节	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与全球卫生治理模式 / 16
第三节	国际卫生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全球卫生治理困境 / 21
第四节	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化影响 / 22
第五节	中国与国际卫生治理模式的重塑 / 27
第三章	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中俄北极油气合作的风险及管控 / 32
第一节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 32
第二节	中俄北极油气合作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属性 / 34
第三节	中俄北极油气公共产品供给合作的风险与管控 / 40
第四章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供应链的中国布局 / 47
第一节	金融危机后的全球供应链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 47
第二节	供应链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相关研究 / 49
第三节	供应链的中国布局 / 56
第四节	区域性公共产品背景下的中国供应链布局 / 64

第五章	区域性公共产品视角下中国国际技术转移机制建设 / 71
第一节	技术转移的定义 / 71
第二节	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来源 / 72
第三节	国际技术转移机制与区域性公共产品 / 73
第四节	中国国际技术转移机制的成效与挑战 / 77
第六章	中亚有效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 / 87
第一节	中亚地区环境治理及公共产品供给 / 87
第二节	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域外行为体供给分析 / 92
第七章	澳大利亚船民治理模式与区域性公共产品(1975—2018年) / 100
第一节	澳大利亚船民治理模式概述 / 101
第二节	澳船民治理模式的公共产品供给分析 / 108
第三节	船民治理类公共产品的改进建议 / 113
第八章	“一带一路”安全合作体系的建构——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为例 / 118
第一节	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 / 119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风险——以俄罗斯为例 / 120
第三节	俄罗斯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 / 127
第四节	中俄安全类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模式 / 133
	主要参考文献 / 140
	后记 / 145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议题。全球治理的核心目标是提供充足的国际公共产品来保障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国际公共产品对学者们来说仍是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概念,在面临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时,它有助于我们寻求多边解决方式。例如,国际公共产品在协调专业化分工之后的交易行为以及相应的资金对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依照奥尔森(Olson)的集体行动理论的观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较为困难,^②因为全球主义并不是理想的合作性博弈模式,即参加博弈的行为体数目越多,合作性博弈的复杂性和困难就越大,困扰合作的“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免费搭车”等问题就越难解决。^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通过多边机制提供了部分国际公共产品,但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承担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意愿明显下降,从过去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成了“选择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美国的国际公信力和执行力遭受多方质疑,以往建立起的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价值观遭受重创。

而在过去 10 年间,中国正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一带一路”倡议、澜湄合作机制、亚投行、金砖银行、“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理念等由中国创造的优质国际公共产品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为全

① 黄恒学:《公共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8—49 页。

②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 页。

③ 张建新:《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地区一体化的新视角》,《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09 年第 1 辑,第 31—49 页。

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做出中国贡献。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中国面对全球公共危机展现出了令世界瞩目的高效领导力。例如,中国积极提供了多种全球卫生公共产品;同其他国家分享抗疫经验和病毒信息;积极提供医疗物资和医疗专家援助;通过多边机制促进全球抗疫方案的制定;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成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等等。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发展变化提醒我们,在全球治理呈现新问题与新特征、全球治理体系在各个层面面临变数之际,哪些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与供应需要各国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中国在其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能够做出哪些贡献?本书提出一些典型案例并进行了探讨,力图勾勒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内涵、意义及未来发展方向,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贡献绵薄之力。

第二节 国际公共产品的理论起源

在经济学中有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分。前者指私人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家庭,他们提供的产品称为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后者指各级政府及其经营的企(事)业,他们提供的产品称为公共产品(public goods)。^① 古典经济学引入了“公共产品”的概念,之后的现代经济学对公共产品进行了理论体系的构建,保罗·A. 塞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正式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其消费的产品”,这是公共产品的第一个基本特性——非竞争性。^② 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指出,“集体中的任何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无法被有效地阻止和排除”,这便是公共产品的第二个基本特性——非排他性(nonexclusive)。^③ 这一时期的公共产品理论主要围绕国内层面展开。

20世纪60年代,公共产品理论走出经济学范畴,被嵌入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于解释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1966年,曼库尔·奥尔森、理查德·扎克豪泽

^① 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三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5页。

^② Paul A. Samuelson.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1954, p. 387.

^③ Mancur Olson.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4.

(Richard Zeckhauser)发表《国际联盟的经济学理论》一文,并指出,美国为实现霸权收益而自愿为北约承担巨额安全成本,并容忍小国的“搭便车”(Free Rider)行为。^①之后,奥尔森以“国际集体产品”(International Collective Goods)的概念为框架,将其分为三大类:保证国际经济交往的国际贸易体系;可以抑制和协调冲突的国际安全保障体系;对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形成的国际经济援助体系,以强调它们在国际合作中发挥的激励作用。^②

国际公共产品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稳定和正常运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分析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指出,经济危机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国际层面领导者的缺失,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需要某个国家成为“稳定器”(stabilizer)。^③当货币制度停滞失灵时,它作为主导者愿意建立某种再贴现机制,可以为亏本产品提供市场,为其他国家确立行为准则,为体系承担超过应有份额的负担,即“公共成本”。^④金德尔伯格随后明确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的概念,强调国际公共产品在国际秩序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⑤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继承了金德尔伯格的思路,进一步运用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使之成为“霸权稳定论”的基础,认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拥有者就是一个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领导者。霸主利用巨大的经济剩余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巨大成本,霸主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起到了维护国际秩序的作用。^⑥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讨论了国际合作问题,但并没有给予“国际公共产品”一个清晰和明确的定义。

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公共产品被运用于全

① Mancur Olson and Richard Zeckhauser. An Economic Theory of Alliances.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8, No. 3, 1966, pp. 266 - 279.

② Mancur Olson. Increasing the Incentiv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5, No. 4, 1971, pp. 866 - 874; Mancur Olson.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③ Charles P.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 - 1939*.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73, p. 305.

④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 - 254.

⑤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1986, pp. 1 - 13.

⑥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球治理领域。学者们将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延伸,提出了“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的概念。托德·桑德勒(Todd Sandler)根据外部性效应的溢出范围(spillovers),对国家公共产品(national public goods)、跨国性公共产品(transnational public goods)、区域性公共产品(regional public goods)和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全球公共产品就是外部性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都能产生效益的公共产品。^① 世界银行认为,“全球公共产品是指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政策体制,他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十分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② 全球公共产品是国际公共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深化后的进一步拓展,以全球治理为视角,其本质都是跨国的公共产品,研究的核心内容皆为如何通过合作来达到跨国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立足于全球问题治理与解决的层面,本章将以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两者的统称。

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合理的分类是研究公共产品供给与合作的基础。根据“公共性”特征,公共物品基本上可分为三类: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是指同时满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两种特性的产品,这种产品是极少数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是指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或有限的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又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池塘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③ 还存在一些具备部分公共性特征但无法给予精准定义的非纯公共产品(impure public goods),例如,联产品(joint products)是指单个活动产生了两个或更多结果,并且这些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共性特征”;^④ 有益品(merit goods)是指“通过制定干预个人偏好的政策而提高生产的物品”,这种特性意味着有益品主要是由国家提供;^⑤ 虚幻满足产品(feel goods)是世界银行近期提出的一种产品概念,它用以形容对产品的供给具有大量需求,但供给者对实

① Todd Sandler and Richard Cornes.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Public Goods and Club Go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Development Committee. *Poverty Reduction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ssues for the World Bank in Supporting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DC/2000-16, Washington, DC, 2000, p. 2.

③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Defining Global Public Goods, in Inge Kaul, Isabelle Grunberg, and Marc A. Stern, eds.,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5.

④ Richard Cornes and Todd Sandler. Easy Riders, Joint Production, and Public Good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94, No. 375, 1984, pp. 580-598.

⑤ Ricard A. Musgrave. A Multiple Theory of Budget Determination. *Finanzarchiv*, N. F. 17, 1956/1957. Heft 3, pp. 333-343.

际产生的收入是否能够摊销成本并无期望的产品。^①

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于1983年开创了汇总技术(aggregation technologies)理论,他认为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取决于可消费的总量,从而拓宽了公共性的第三维度。^②而后,桑德勒等人对这一理论加以延伸,将汇总技术扩展为总和技术(summation)、加权总和技术(weighted sum)、最佳表现技术(best shot)、次佳表现技术(better shot)、最薄弱环节技术(weakest link)、较弱环节技术(weaker link),用以分析国家投入和产品总体供给水平之间的关系(见表1-1)。^③聚合技术理论超越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及其论争,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研究普遍认可的分类方式,这是对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方式的新探索。

表1-1 汇总技术分类框架下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分类

汇总方法	纯公共产品	非纯粹的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品	联产品	是否需要国际合作	合作是否具有挑战性	供给方法
总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总水平等于各行为体贡献的总和	大气污染的净化	传染病的治疗	卫星交流网络	雨林保护	是,需要确定实现一个总体的结果的个体行动并且选择一个共同标准	是	根据条约或决议
权重加总:公共产品供给的总水平等于各方贡献乘以不同权数的总和	环境污染的减少	酸雨的减少	自由贸易协定	恐怖主义威胁的消灭			
最薄弱环节:行为体的最小贡献决定了公共产品整体供给水平	有害垃圾污染的控制	防控毒品	交通运输网络	减少自然灾害	是,需要建立行动最低标准规范	是	根据共识或习惯法
较弱环节:最小贡献对产品供给总水平影响最大	组织农业虫害的蔓延	保持消毒	运输基础设施	互联网的联通			

^① Wilfred Candler. The World Bank and poverty: cause or cure?. *NZ Trade Consortium working paper*, No. 11, 2000.

^② Jack Hirshleifer. From Weakest-link to Best-shot: The Voluntary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Public Choice*, Vol. 41, No. 3, 1983, pp. 371 - 386.

^③ Todd Sandler. Global and Regional Public Goods: A Prognosis for Collective Action. *Staff General Research Papers Archive*, Vol. 19, No. 3, 1998, pp. 221 - 247; Todd Sandler. Regional Public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 No. 1, 2006.

(续表)

汇总方法	纯公共产品	非纯粹的公共产品	俱乐部产品	联产品	是否需要国际合作	合作是否具有挑战性	供给方法
最佳表现：产品总体供给水平取决于做出最大贡献的行为体	疫苗的开发	转基因物品	卫星发射设备	维和行动	是，需要决定应该做什么，哪个行为体应该支付	否	根据条约或国际组织
次佳表现：最大贡献对产品供给水平影响最大	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	政治不稳定情报的搜集	有害生物防治设施	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资料来源：樊勇明等：《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8 页。

第三节 区域公共产品的概念起源

随着区域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区域合作逐渐兴起，为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目前，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基本上建立在萨缪尔森对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及“非排他性”的基础上，多聚焦于货币和金融等领域的秩序、基础设施、环境治理、区域安全、传染病控制等方面。

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早在 1968 年对“国际区域”做出定义：“一定数目的国家因地理关系和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而联系在一起”。^①从广义上来讲，区域是指“涵盖全球和单个国家外的任何跨国性空间范围”^②；而区域公共产品则是指“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③桑德勒对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根据其特征进行了分类，即卫生、环境、知识、政府治理、和平与安全、基础建设六大领域（见表 1-2）。

① 杨国庆、黄帅：《西方地区公共产品理论及其政策意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0 年第 9 辑，第 15 页。

② 杨国庆、黄帅：《西方地区公共产品理论及其政策意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0 年第 9 辑，第 15 页。

③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6 期，第 142 页。

表 1-2 各领域中的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特征

	汇总技术	案 例	侧 重 点
卫生	最弱环节	检测疾病暴发、保持医院消毒	能力关系
	最佳表现	地区性疾病的疫苗研制和医治方法	
环境	加总、权重加总	抑制酸雨、降低跨界烟幕、保护雨林、防范洪水	信息
知识	最佳表现	农业扩展服务、数据和信息交流网络、气象研究成果、公共产品外溢范围的规划	汇集力、领导力
政府治理	最弱环节	采用健全的金融体系、监测金融实践、使各国交通常规协调化、消除贸易障碍	合作需要
和平与安全	最弱环节	消除叛乱、减少恐怖主义、抵抗组织性犯罪、发现情报	合作与能力
基础建设	最弱环节	河流域发展、跨国高速公路、能量输送网、轨道交通	合作与能力

资料来源：樊勇明、薄思胜：《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区域合作新视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樊勇明进一步指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区域合作进行理论解释的一种新尝试。因此有必要根据国际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形势，对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进行改造和重构，提出‘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① 有关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提供有助于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国际公共产品将有可能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② 张建新提出，“在公共产品的霸权国供给、全球集体供给与地区合作供给这三种模式中，地区主义作为霸权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补充和替代具有最接近供给最优先水平的优势。”^③

王方方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质上是一个区域公共产品（“俱乐部产品”，例如区域性经济组织、制度与规则等）的提供过程。诸多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根本原

①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观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7页。

② 樊勇明：《东亚合作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发展·效率·公平：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张建新：《霸权、全球主义和地区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多元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第31—37页。

因就在于区域性“俱乐部产品”自身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存在于俱乐部内外的其他因素造成的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如此,排除上述瓶颈因素并解决区域公共产品的缺失问题^①将是促进经济一体化的根本举措。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逐渐兴起,世界向多极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合作不断加强——欧盟、东盟等地区联盟都为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兴起提供了实践经验。在这一背景下,区域性公共产品对推动区域合作的积极作用逐渐得到认可。奥尔森早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就解释了区域性公共产品对于推进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利益的独特作用。我国学者樊勇明也指出,区域公共产品通过协商来分摊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公共产品被大国“私物化”,且其覆盖范围相对较小,使得各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更显而易见,有效避免了“搭便车”现象的产生。^②简单来说,区域性公共产品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优先满足区域内成员的需求,而非霸主国;并非由霸主国提供公共产品;“由政治制度来实现需求与供给”。^③

为了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各个区域联盟在实际操作中设计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2001年,布鲁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和哈维·斯塔尔(Harvey Starr)就从理论上提出了六种可能的制度设计:① 霸权国利用其实力优势,强制制定规则并要求成员分担成本;② 由区域内的一个或几个成员来承担主要成本;③ 通过收益与付出来激励成员承担成本;④ 区域集团利用私人产品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并分担成本;⑤ 通过共识来增加区域认同,从而提升成员负担成本的意愿;⑥ 通过建立区域联盟,以协议的方式达成合作。^④《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的机制与第一种类似,美国由于其明显的优势,在其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欧盟则属于第二种机制,即由德法两国提供主要的区域公共产品,但是,欧盟也通过一定的机制,例如,控制准入门槛等来避免“搭便车”现象的产生。

在区域合作成为必然趋势的当下,中国也积极为区域合作和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做出自己的贡献。随着中国的崛起,如何为区域发展做出贡献,从而改

① 王方方:《公共选择理论与中日韩经济一体化困境》,《党政干部学刊》2006年第2期,第10页。

② 樊勇明:《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解析区域合作的另一个理论视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期,第12页。

③ 樊勇明、薄思胜:《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区域合作新视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5页。

④ [美]布鲁斯·拉西特、哈维·斯塔尔:《世界政治》,王玉珍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380—382页。

善自身的国际环境,并加大我国对国际秩序或行为准则的话语影响力是我国必须重视的重要命题之一。2013年,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可视作中国为区域发展提供中国智慧的一次重要尝试。“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意图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手段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在这一平台上所进行的多种跨国活动均具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性质。

第四节 主要思路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计八章,其中第二章至第八章为主体部分。

第二章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世界意识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正陷入困境。在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这种困境具体表现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不足、难以达成合作共识以及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私物化等方面。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卫生公共产品的政治化问题。以卫生议题为手段来追求政治目标无疑恶化了全球卫生治理的合作基础,导致霸权供给、多边主义机制供给和区域主义机制供给的失衡,使得全球卫生治理模式失灵。应对困境的根本途径是改善政治化的负面影响,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共同承担起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治理新兴力量,应扮演好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卫生治理机制的创新者和国际卫生合作的协调者三大角色,为未来全球卫生治理模式的重塑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章指出,北极地区具备国际关系研究中“区域”概念的鲜明特征。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区域性公共产品”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词汇,也为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油气合作提供了极好的分析框架。历史上能源合作的积累也决定了中国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油气合作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深厚的制度基础。不可否认的是,在北极这一国家利益牵扯复杂、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双方的油气合作仍存在诸多风险。在新的合作阶段,双方应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出发,对中俄在北极地区的油气合作存在哪些风险、中国应采取何种管控措施等问题进行解答。

第四章聚焦于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供应链的中国布局。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是全球治理中的两个重要现象。中国通过贸易双环流

体系、海外经贸合作区和第三方市场合作三种多元化的供应链布局模式来增强供应链抗风险和发展能力。供应链构建主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培训机会、协同和合作建设、融资渠道。而中国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例如,区域性基础设施、区域性金融公共产品、多边合作机制和消费市场的开放满足了供应链构建主体的需求,有利于推动中国的供应链布局。

第五章指出,由于霸权国家刻意维持“中心—边缘”的技术结构权力,国际技术转移的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在试图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技术转移制度失败后,技术转移类公共产品的区域供给成为替代性选择。自2012年以来,中国建立了六大区域性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但其面临着长效供给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在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责任与能力之间进行平衡。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中国经验势在必行,可就区域共识先形成知识产权管理机制,并创新融资方式,以合理分担公共产品成本。

第六章基于中亚地区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指出中亚的环境治理呈现出积极势头,域外行为体参与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环境治理与国际关系提供了交叉的视角。通过分析中亚环境问题及国际多边合作的现状,本书认为现有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理论难以解释当前中亚有效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由此提出了“供给功能与供给能力”的概念,强调域外行为体在供给环境类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同时,应关注其供给能力在有效环境类区域公共产品中的作用。

第七章研究了越南战争后,基于澳(澳大利亚)新(新西兰)太平洋移民治理体系的澳大利亚船民治理模式以及该模式框架下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策略(霸权模式和南北合作模式),指出这一领域现有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缺陷。2001年,联盟党霍华德(Howard)政府借“9·11事件”影响,采取强硬措施,推行“太平洋解决方案”,以控制船民的数量,使之后的澳船民治理模式成为太平洋移民治理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工党上台后推行“马来西亚方案”,但被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否决。后来出于选举需要,第二次上台的陆克文(凯文·迈克尔·拉德, Kevin Michael Rudd)试图通过“巴布亚新几内亚方案”挽回人心,无奈大势已去。选举胜利后的历届联盟党政府为了迎合国内的民粹主义,通过一系列举措并出动海军逐步加强对船民的控制,直到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全球移民契约。澳大利亚虽有在区域船民治理体系中提供相应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意愿以及能力,但其通过拦截等方式阻止船民寻求法律和经济上的帮助并没有在真正意

义上达到难民保护和消除人口买卖之目的。

第八章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安全公共产品尤为引人注目。许多地区开始采取由地区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弥补仅依靠全球公共产品带来的缺陷。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安全产品的模式具有借鉴意义。本章以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面临的安全风险为例进行个案分析,归纳俄罗斯的公共产品需求、现有地区供给模式以及中国模式的应用路径,并提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建议。

笔者限于学识,书中难免舛误,敬请读者不吝指正。